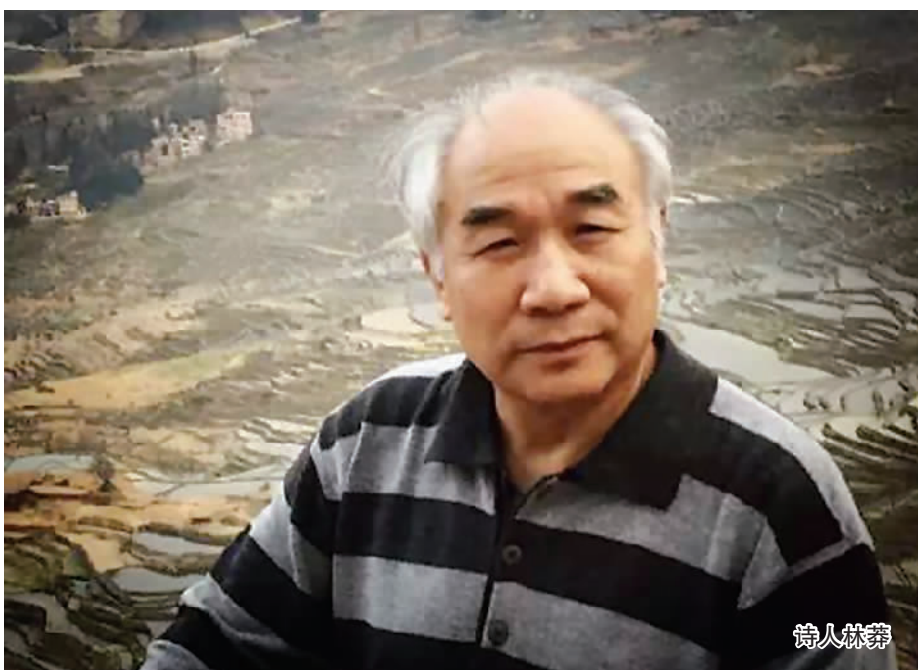


# “我寻求那些寂静中的火焰”

——诗人林莽访谈

■ 吴投文 林莽



诗人林莽

吴投文:作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重要一员,当时如何想到去白洋淀插队的?也请谈谈你在白洋淀插队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

林莽:一九六八年,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大多都离开北京,到各地的兵团、插队或跟父母到五七干校了。秋冬两季,我和几个朋友连续几次骑自行车到白洋淀考察,并决定选择到更自由、离北京更近的白洋淀插队。白洋淀同全国一样,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中国乡村,不同的是,那里是中国北方唯一的水乡,有较好的人际环境。

社会动荡,家庭危难,那个时候,一个有问题家庭的子女是看不到未来与前景的。但作为不甘于沉沦,心中有梦想的青年,我在白洋淀找到了诗,这种可以抒发内心的感悟与苦闷的艺术方式。一九六九年,在插队生活的第二年的夏天,我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尝试,那些年保留下来的第一首诗《深秋》,就是一九六九年冬天完成的。《浪花》《列车纪行》《悼一九七四年》《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应该是我那个时间段的代表作。

吴投文:一九七〇年冬天,你写了《自然的启示》一诗:“初冬的原野上/挣扎着违时的嫩苗/寒风的冬日把它/由苍绿变为焦黄/孤独的柳树/在狂风中不时地弯下腰/洒下枯干的树叶/无奈地抖动着光裸的枝条/赤红的落日/依旧现出柔和的微笑/在紫色云霞的簇拥下/投入群山的怀抱/浪漫、恬静、死寂/这就是初冬黄昏的格调”,诗中有一种清幽冷寂的情绪意味,可能表达了当时你对生命的某种反思。这首诗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我也注意到不少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首诗。还记得当时的写作情境吗?请谈谈。

林莽:《自然的启示》诗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写的,那是我插队生活的第二年。我在写一篇回信中写道:“那是在孤岛上日子。既有正午的阳光,也有深夜的冷雨。对于一个心灵充满压抑的青年,对于一个离家孤独生活的青年,那些年底意味着什么?深夜,阔叶树发出哗哗的声响,我住的村边小屋外是一片开阔的水面,没有星光和渔火,我在孤单中思念,既凄楚又担忧。在夕阳西下的堤岸上,一边是一片紫色的土地,一边是一片无垠的湖泊,我默默地走着,世界无依无靠。冬日的树木干枯凋零,几丛芦苇在岸边摇曳,孤雁的鸣叫声声远去。冬日的白洋淀一片冰天雪地,灰褐色的云层笼罩着天空……尽管,我关注着每一天的新闻,但是家庭及个人的命运被一只无形的手把握着。那些日子虽是青春却充满了阴影,那些日子向谁诉说?向谁倾诉?在寂静的寒夜中,我找到了诗:这种与心灵默默对话的方式。”以上这些文字就是我写这首诗时的心境。

吴投文:你写了一些象征的手法,我们的确像一群反季节的嫩苗,在那片冬日的土地上抗争着不公的命运。

林莽:在自然的启示中,长诗《记忆》可能算是一首比较特别的作品,触及到了你对历史的某种追忆,也可能有现实原因的触发。诗抒情风格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由原来的内敛、沉静转向了激烈、喷发。这首长诗展开了你对过往生活、对白洋淀岁月的回忆,也融入了你的现实感吧。请谈谈这首长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创作的?

林莽: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年之际,我读到了许多回忆文章,我青春年代的许多难忘的记忆不时地在我脑海中闪现,那年我有了创作一首相关长诗的冲动。

这是一首以个人的个体生活体验讲述一段历史的长诗,我选取了一些我所经历的生活细节,想用一个人的经历还原那一段非同寻常的社会历史,以有别于那些大而空的所谓的宏大叙事的政治抒情诗和空泛而艰涩的伪现代诗。

即使是讲述自己亲历的生活,我们知道一首长诗是需要文化底蕴和写作功底来支撑的,我写到第三大部分时,就觉得底气很不足了,因此又拖了一段时间,进一步做了阅读和思考的准备,三年才连续完成了长诗《记忆》的写作。

这首诗中第一部分是那场风暴的初期记忆,第二部分是插队生活阶段的记忆,第三部分是我对那段特殊时间的认知与感悟。历史就像我在前一首诗中讲到的:“有时候/人们离去的比时间还要快”(摘自《秋天在一天天逼近尾声》)。刚刚写完时我对后一部分还存有疑虑,不是很满意,现在读来,感觉还是基本完成了我最初的设想。

吴投文:很多读者注意到了,一九九一年九月,你写了一组“夏末十四行”。在一九九七年和二〇〇一年,你又写了两组“夏末十四行”,这三组诗对照起来,别有趣味,似乎都具有自言自语的性质,流露了你真实的心迹。在新诗史上,很多诗人尝试了十四行诗的写作,像朱湘、冯至等人的十四行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你怎么想到要写十四行诗的?怎么看待十四行诗本土化?

林莽: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诗歌写作上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目睹中国新时期诗歌发展进程,感到我们诗歌写作中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在先锋写作群体中,许多诗人为了先锋而先锋,一些诗人写了似是而非,虚张声势的作品,一些人仿照翻译体的诗歌,随意分行,简单叙事,缺失了汉语写作的语言魅力,也因此倒了许多读者的胃口,令他们远离了诗歌。

诗歌是语言和情感经验的艺术,缺少了内在情感,缺少了汉语语言的艺术,也就没有了诗歌。鉴于此,我针对自己的诗歌写作进行了反思。尝试着用十四行的方式控制诗的语言和结构,努力在一定的行数内完成好

一首诗的构想,目的是让自己的写作不再过于随意和松散,让诗的语言更讲究内涵,跳跃和空灵。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对写作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同时也写出来一些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如:《夏末十四行·谷仓》《夏末十四行·满月》《夏末十四行·玫瑰》《夏末十四行·老树》《夏末十四行·梦舞》《夏末十四行·裂痕》等等。

严格地说,我所写的十四行仅仅是外表形式上的,它们的样式很不严格。但这种练习对我的诗歌写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它让我在结构的控制,在语言的表达上有了新的体验。诗歌是一门讲究语言精确和结构严谨的艺术,诗歌写作是语言艺术中最难把握的,它要求每一位诗人都应是语言精湛的匠人,正像茨维塔耶娃所说的“作为匠人,我懂得手艺”。

吴投文:从长诗《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到长诗《记忆》,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时间,中国诗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也是经历了个人风格的变化。不过,在你的创作中,还是保持了一些基本稳定的东西。张清华先生认为,你的创作与芒克有相近之处,都称得上是自然诗人。我觉得这把握住了你的一个重要创作特色,自然似乎构成了你的一个创作情结。

林莽:我基本同意张清华教授的判断,我在给《草堂》诗刊的一篇短文中说:“我是一个依赖感觉写作的诗人,因此大部分诗歌都是些零散的短诗作品。当然也写过一些较长的和同种主题的组诗,因为情之所致,因为内在情感的积淀,构成了一首长诗或组诗的量,才在具体写作中逐步谋篇完成的……诗歌记述了我生命中的真情历程。将感性的记忆,通过诗歌的方式,建立一个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艺术的世界,是我的诗歌理想。……诗歌给了我某种救赎,是诗歌让我内心的爱有了方向。”

可以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有感而发的,没有内心的波澜我不动笔。

从另一个角度谈,我的诗中自然意象、自然风光较多,山川海洋,四季轮回,鸟兽植物,都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诗句中。色彩和画面感,和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绘画不时地,它们增加了我的诗歌的感染力。

我想一个人内在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一个忠实于内心的写作者,他的作品一定会具有一脉相承的写作风格。

吴投文:陈超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林莽的方式》,这个题目就很好,文中分析了属于你的诗歌话语方式。他在文中还谈到了你创作的几个阶段,这样说,“林莽经历了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初期写作;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三年约十年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寻求;一九八三年后有意识地脱离群体而进入‘个人性’的创作;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对人的内在精神、人类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及语言艺术本质的关注四个创作阶段。”(陈超《林莽的方式》)你觉得是这样的吗?请谈谈你的创作在不同阶段的变化。

林莽:我从一九九〇年开始诗歌的写作,经过最初五年和后来近十年的学习、阅读、练笔,到一九八三年开始思考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歌之路。我觉得前些年诗歌,无论是语言应用、构思方式与大多数的朦胧诗人过于相近,作品更多地关注社会表象问题,缺少了对语言艺术更深入的追求。那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后来收录到北大五四文学社编辑的未名湖诗丛《青年诗人谈诗》一书中。在这篇短文中我提出:应该退去我们习惯的社会色彩,更多地回到对诗歌艺术本质的寻求上来。

以后几年,我有意识地脱离群体,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歌品质与风格,我前后用了三年时间,一九八五年我写出了《灰蜻蜓》《晨风》《滴漏的水声》《水乡纪事》等一些诗歌后,我觉得我已找到自己的诗歌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更自觉地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着自己的探索与追求。

我同意陈超教授的描述。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还在不断地自我修正。诗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年龄的有变化,诗歌中的情绪、认知、感悟也一定会有所改变,这种变化是正常的。

吴投文:一九七三年底,你写出了《列车纪行》,开始转向了现代主义创作。你最早接触现代主义诗歌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当时在知青中阅读比较多的外国诗人有哪些?

林莽:一九七二年前后我开始接触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思潮,它像一股崭新的阳光射入了我幽暗的心灵。《在路上》《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海鸥纳森》,存在主义,印象派等等哲学、绘画和小说与我们当时的心境一拍即合。

那些黄皮书和灰皮书告诉我们这些在那个特殊年中迷失的一代青年,我们也是“垮掉的一代”,他们颓废中的寻求和反叛中的抗争也正是我们的生命写照,我们也在彷徨中寻找,也在逆境中进行着人生的自我设计。也像海鸥纳森一样:天生就应该飞翔,自由是生命的实质,任何妨碍自由的东西都应该摒弃,不管什么形式的限制。

梵高、塞尚、毕加索、萨特、波德莱尔、聂鲁达、洛尔迦、艾吕雅、阿拉贡、金斯伯格、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布洛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爱伦堡、叶甫图申科、沃兹涅辛斯基等一批伟大的诗人的作品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抄诗本上,是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的写作有了新的方向。

吴投文:波德莱尔对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很大,也对朦胧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请谈谈“白洋淀诗群”对波德莱尔诗歌的阅读。

林莽:我一个抄诗本上开头便是波德莱尔的九首诗,《太阳》《朦胧的黎明》《薄暮》《天鹅》《穷人的死》《仇敌》《不灭的火炬》《忧郁病》《黄昏和声》。这些作品有一种基调,这种基调在食指、北岛、江河、多多、芒克的诗中都能找到。我的诗中那种忧郁的情调也应与此相关。

我记得我们在油灯昏黄的聚会中,总有人会读起波德莱尔的诗:“我的青春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黑星点透过未来明朗的太阳”。昏暗、忧郁、狂吹的猎角、黑色的墓穴、青春的祭坛,这些都成了我们心中经常闪现的词语,也如同波德莱尔诗中说的“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从来没有尝过家的甜蜜,从来不曾生活过”这些触动我们心灵的诗句,令我们爱不释手,它也逐渐地融入了我们的心灵与行动中。我也同年轻的法国诗人一样:“我独自一身锻炼着神奇的剑术/在各自的角落里寻找偶然的韵脚/我在字眼上踌躇,像在路上一样/有时也会碰到梦见已久的诗行”。他应该是我们的启蒙者之一。

吴投文:你和多多等人都曾在文章写过,当时白洋淀写诗的人不少,除了“三剑客”,还有宋海泉、方含等人。北岛、江河、袁家方、史保嘉、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作家也到白洋淀游历过。北岛到白洋淀的次数多吗?你当时见过他没有?

林莽:白洋淀诗群广义上说,是一个北京知青那代人一同追求现代艺术的以白洋淀为中心的群体。真正在那儿生活过的有作品留下来的诗歌写作者有十多人。北岛、江河、食指等都到过白洋淀。江河曾有过较长的时间在那儿逗留,他的第一首诗就是在插队的村子里写出来的。北岛去过白洋淀,但时间较短,他到过芒克插队的大淀头村。我和北岛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白洋淀时没有见过北岛。

吴投文:诗人食指(郭路生)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之后才被逐步挖掘出来。在食指“复出”的这一过程中,你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就凝聚了你的大量心血。谢冕先生说过:“一九九八年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将食指浮出水面。”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你怎么看待食指的“复出”现象?

林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个欠债的历史,许多诗人、作家本应得到的荣誉,被历次社会动荡或政治运动所遮蔽。食指就是这样,在他那些与时代同步的优秀作品传播之时,他却因不合时宜而跌倒在尘埃中,我一直想应该还历史以公正。这就是我做这件事的最初动力。我记得,八十年代末评《今天》诗歌奖时,我就表达过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评给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影响和启示的诗人食指,但后来没有实现。

为了诗歌的荣誉,为了还历史以公正,九十年代后期,为食指卷的出版我大致用了三四年时间搜集、整理食指的诗歌作品和生平简历,联系出版事宜。《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后在北京、山东进行了多次宣传和推广工作,为那一年食指在文化领域的全面复出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年电视、广播、报纸

吴投文,一九六八年生,湖南郴州人。二〇〇三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和诗集《土地的家谱》《看不见的阴影》等。

林莽,原名张建中,一九四九年生。白洋淀诗歌群落主要成员、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我流过这片土地》《永恒的瞬间》《林莽诗选》《秋菊的灯盏》《记忆》等,诗文集《时光瞬间成为以往》《穿透岁月的光芒》《林莽诗画集》等。现任《诗刊》编委,《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众多的宣传和报道,那一年我们为食指开了多次读书会,朗诵、报告和生日等多次活动。应该说那一年食指的复出是文坛的一件大事。

食指的复出不光是还食指以公正,也是对中国新诗史的一次修复,也是新诗再次走出低谷的一个标志。这之后的“盘峰诗会”和随之而来的新世纪新诗的复苏,为汉语诗歌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吴投文:一九六九年,你通过江河读到了食指的《相信未来》《烟》《酒》等几首短诗。那年,你也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诗。你最初写诗是受到食指的启发吗?此前写诗没有?据说食指的诗在当时知青中的影响很大,不过,现在也有研究者表示质疑,说食指的诗还是局部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北方几个知青集中的地方。可否谈谈食指诗歌在当时的传播情况?

林莽:在读到食指作品之前我已经开始了诗歌写作的尝试,那时是受中国古诗、俄罗斯、法国、英国文学的影响,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等小说和诗歌的影响。但那些毕竟是遥远的,而食指的诗,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他所写的就是我们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那种触动和激励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中所说的:“现在也有研究者表示质疑,说食指的诗还是局部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北方几个知青集中的地方”,这种说法很可笑。试想,一个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多位重要诗人的写作者,他的地位还用怀疑吗?何况还有他的作品清晰地摆在那儿,那些为一个时代立下的诗歌,一位填补了历史空白的诗人的重要性还要怀疑吗?

据我所知,许多北京青年都曾读过和手抄过食指的诗,我认识的无论在北京、东北、内蒙古、陕西、云南及白洋淀的那一代青年,都有人是食指诗歌的传播者,他们都曾为食指诗歌中所写出的那一代人的声音所感动。

食指诗歌的传播虽然不家喻户晓,但是最有效的,他的诗歌填补了那个特殊年代文学的空白,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先驱者。

吴投文:一九九四年五月,你全程组织了一次“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芒克、宋海泉、甘铁生、史保嘉等与白洋淀知青相关的人参加了寻访活动,“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个提法就是在这次寻访的讨论会上确定的。我注意到,有些白洋淀知青诗人缺席了,参加寻访活动的人员名单是怎么确定的?请具体谈谈这次寻访活动。

林莽:“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是《诗探索》编辑部计划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诗歌群体进行寻访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具体课题,因为我了解当时和当地的情况,就由我牵头组织和安排了那次寻访活动。这期间华北油田的诗人张洪波和河北油田文联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当时白洋淀的诗人有些联系不上,有些在国外,比如:多多在荷兰,根子、江河在美国,孙康没有联系上等等。这次寻访活动后,许多老朋友又逐步地恢复了联系。

这次寻访活动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寻访中确立了“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名称,不再是一些人所称呼的“白洋淀诗派”等等混杂的概念。寻访后,宋海泉、史保嘉、甘铁生等写出了很有价值的回忆文章。后来杨桦、赵哲等又有一些后续的文章,陈超为这次寻访撰写了《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的研究文章。这些为以后对“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吴投文:一九九八年,你率先提出并协助组织了“盘峰诗会”。由于会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分化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这次诗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也使人们在会上产生了种种误解和猜测。“盘峰诗会”搅动了沉寂十年的中国诗坛,可以说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道分水岭,尤其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要组织这次诗会,会上的具体情况怎样,可否谈谈?

林莽:一九九八年我阅读了沈奇的文章《秋后算账》,这是一篇针对程光炜主编的九十年代诗选《岁月的馈赠》所引发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撰写的倾向于批评这本书有偏颇的文章。从这篇文章我想到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有关诗歌写作中借鉴西方文化还是更多地关注本土意识的审美倾向,这一问题虽然还没有提到表面上来,但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我想这一写作美学观念下的

争执,一定会有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因而在《诗探索》编辑会上提出了开一个“打架的会”的想法。将主张“知识分子写作”和主张“民间写作”的诗人召集在一起,进行一次当面的争论。这一提议得到了谢冕、吴思敬、杨匡亚三位主编和编辑部全体同仁的赞同。

因为资金问题,我找到了北京作协秘书长李青和《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这一会议的内容也得到了她们的认同和支持。通过北京作协我找到平谷的作家柴福善,他帮助联系了平谷的“盘峰宾馆”。这样,这次会议得以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北京平谷盘峰宾馆举行。

当时吴思敬教授为诗会定名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由《诗探索》编辑部、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文学》编辑部、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

会议开了三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各个剑拔弩张,有时甚至就要互动起手来。有人找我要求晚上不休息接着开。中间有一个傍晚,诗人到金海湖大坝上散步,相互间还是比较友好的,身体勾肩搭背,但嘴上却互不相让。

诗人们就各自的主张和对方写作的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辩论与争执。也有人将相互之间具体的矛盾和对某些问题中的积怨拿到了会议上。这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诗人之间第一次对诗学观念面对面的论争。“盘峰诗会”之后,中国新诗开启了一个写作的新时代,许多新的诗人大量地涌现出来。

我在这次会议的最后总结阶段有一个简短的发言,我大致说:中国先锋诗坛不只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一对矛盾,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有许多的人自我膨胀,大师满天飞,我们在许多地方会与大师相遇,在诗人的聚会中,在朗诵会上,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都会遭遇大师,有时大师与大师的相遇,令空气凝结,让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的许多诗人浅薄地忘记了对诗歌的敬畏之心。在艺术面前,我们应该永远虔诚,永远静心以求。

“盘峰诗会”期间,作家柴福善作为旁观者,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听会笔记,《诗探索》曾在“会刊”上全文刊载。

这次会议后,与此相关的双方诗人还各自撰写了大量的争论文章,许多无知者隔岸观火,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说:先锋诗人为争地盘打起来了。这种说法丝毫不了解其中的诗学价值。

吴投文:你长期担任《诗刊》和《诗探索》的编辑,在《诗刊》和《诗探索》的工作中有许多独特的创意,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请结合你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谈谈你的体会和想法。

林莽: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一直想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些事情,现在回忆一下,我的一想法还是有了一些兑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诗坛的沉潜和修复诗歌史的努力;组织了一九九四年的白洋淀诗歌寻访;完成了一九九八年诗人食指浮出水面两件大事;一九九九年提出和组织召开“盘峰诗会”,为新诗发展开启了一个新起点。

一九九八年我到《诗刊》工作,当时有人问我到《诗刊》做什么具体想法?我曾明确地说:只想为诗歌做些具体的事情。

后来在《诗刊》工作期间,我提出了创办并主持了《诗刊》下半月刊的工作;设计了“华文青年诗人奖”;推出了中国最早的“驻校诗人”的方式;与漓江出版社多年合作编辑年度诗选;组织开展遍布全国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公益活动。这期间还在自一九九四年复刊的《诗探索》兼职,提出创办了《诗探索》作品卷,二〇一〇年退休后创办了会员制的“诗探索诗人会所”,创办了“红高粱诗奖”和“发现诗歌奖”。

在《诗刊》工作期间,创办和主持《诗刊》下半月刊和“华文青年诗人奖”,一个是为青年诗人树立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一个是为青年诗人树立了优秀诗歌写作的榜样。下半月刊为一大批青年诗人走上诗坛,起到了助力作用,也开辟了在中国诗坛下半月刊的新模式。而“华文青年诗人奖”则推出了几十位优秀的中国诗坛的有生力量,并以一个奖、一个研讨会、一本书和一个“驻校诗人”的四个人的方式建立了立体的诗坛生态和方法。

以上这些,包括近些年在《诗探索》的许多工作,都是想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些具体的建设性的工作。《诗探索》我一直在兑现着“为诗歌做些具体的事情”的诺言。

吴投文:你认为要成为一个诗人,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请谈谈。

林莽:我认为,良好的感知力和语言艺术的天分,生命对世界的真切体验和感悟,广泛阅读的文化积累,人生经验和文化经验的融会贯通,是一个优秀诗人必须具备的才能。

吴投文:《林莽诗选》扉页上有一句题词:“我寻求那些寂静中的火焰,你们是属于我的。”这是否代表你的诗观?你的诗歌创作从白洋淀开始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林莽:应该说这不是一种诗观,只是我希望进入的一种诗歌境界吧。寂静,但蕴含着闪耀生命之光的温暖与魅力。

在近五十年的艺术追求中,我理解了里尔克所讲的:“艺术也是一门学习真诚的功课。”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面对这个世界,只有虔诚的人,才会写出被历代人们不断发现的好作品。

(文章来自凤凰读书,略有删节)